

演化经济学译丛

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现代文选： 关键性概念

A Modern Reader in
Institutional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s
Key Concept

Geoffrey. M. Hodgson

[英国] 杰弗里·M·霍奇逊 主编

贾根良 徐尚 王晓蓉 马国旺 译

贾根良 校

 高等教育出版社
HIGHER EDUCATION PRESS

演化经济学译丛



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现代文选： 关键性概念

A Modern Reader in
Institutional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s
Key Concept

Geoffrey. M. Hodgson

[英国] 杰弗里·M·霍奇逊 主编
贾根良 徐尚 王晓蓉 马国旺 译
贾根良 校

高等教育出版社

图字:01-2004-1907号

A Modern Reader in Institutional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s: Key Concepts by G. M. Hodgson

Copyright ©2002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现代文选:关键性概念/(英)霍
奇逊(Hodgson, G. M.)主编;贾根良等译. —北京:高
等教育出版社,2005. 8

(演化经济学译丛/贾根良主编)

书名原文: A Modern Reader in Institutional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s: Key Concept

ISBN 7-04-015975-9

I. 制... II. ①霍... ②贾... III. 经济学-文集
IV. 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77758号

策划编辑 郭 钧 责任编辑 黄 燕 封面设计 刘晓翔
版式设计 王 莹 责任校对 王 超 责任印制 杨 明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免费咨询	800-810-0598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总 机	010-58581000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aco.com
经 销	北京蓝色畅想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http://www.landaco.com.cn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16	版 次	2005年8月第1版
印 张	23.75	印 次	2005年8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360 000	定 价	45.6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15975-00





霍奇逊教授：世界著名演化经济学家，欧洲老制度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著述颇丰。2004年出版其最新代表作：《制度经济学的演化：美国制度主义中的能动性、结构与达尔文主义》。

在英国著名出版社Edward Elgar 2003年出版的经济学家名人录（第4版）中，霍奇逊教授被列为世界上第一流的1168名经济学家之一。霍奇逊教授是欧洲演化政治经济学协会创始人之一，1988年至1997年担任该协会秘书长。他还是经济学改革国际联合会前主席。

2000年，霍奇逊教授在英国赫特福德郡大学创办制度经济学研究中心，并担任该中心主任至今。德国著名演化经济学家威特教授赞誉该机构已成为欧洲在制度经济学研究上的主要中心。自2000年至今，他还编辑出版了《制度与演化经济学新视野丛书》，并于2004年创办《制度经济学杂志》并担任该杂志主编。

演化经济学译丛

- 经济学的危机：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最初 600 天
- 演化经济学：纲领与范围
- 演化经济学前沿：竞争、自组织与创新政策
- 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现代文选：关键性概念
- 创新经济学、新技术与结构变迁
- 从追随者到领先者：管理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技术与创新

封面设计：刘晓翔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内容简介

本书是霍奇逊先生主编的《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现代文选》的中文版,在原英文版基础之上增加了校译者所选录的三篇重要的英文文献。这本及时出版的论文选汇集了世界上在制度与演化经济学领域中主要学者的创新之作,学习、信任、权力、定价、市场、制度以及国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这些关键性的概念是本书的重点,一些论文还对方法论问题进行了探讨,而其他的则是对各种形式的当代和历史资本主义的比较。

这个基本读本的阅读对象是经济学、管理学研究和社会学领域中的大学教师、研究者、研究生和大学高年级学生,那些想要理解现代社会经济体制最明显变化的人们,也可从这个论题广泛但又互补的论文选中获益。导论提供了经济学和社会科学新近发展的历史脉络。本书主编霍奇逊教授是国际著名制度与演化经济学家,他应邀为本书中文版撰写了前言。

演化经济学译丛总序

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但决不会简单地重复。19世纪下半叶在古典经济学解体后,欧美经济学界出现了学派林立的局面。如果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世纪之交的经济理论正在经历着类似的变化。冷战时期两种极化的意识形态对传统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都分别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冷战结束后这两大经济学体系都相继陷入了危机。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危机自不待言,但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危机肯定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按照我的观察,“华盛顿共识”已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回光返照,而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兴起则标志着其统治地位的终结。21世纪初的经济学又将重现19世纪下半叶的“春秋战国时期”,经济学发展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已经来临。

然而,这两个时代肯定也存在着许多重要的差别。例如,19世纪下半叶的许多流派大都是在古典经济学解体后才出现的,而目前所谓的异端经济学各流派,早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统治地位终结之前就已诞生。除了我曾列入演化经济学诸流派的老制度学派、奥地利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和调节学派外,西方异端经济学还包括后凯恩斯经济学、女性主义经济学、激进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其他流派、生态经济学、社会经济学、历史经济学、后现代经济学、后殖民经济学和人类经济学,等等。在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教育体系中,这些流派大都是名不见经传的。但经济学多元主义为这些学派的合法地位提供了根据:包括新古典经济学在内的经济学各流派都是理解经济现象可能的手段,任何一种流派都不应声称对经济问题拥有最终的和全面的答案。

但是,在经济学发展的这种多元化时代,我们是否可以观察到经济学范式的一种根本性转变呢?无疑,这要从我们的时代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去寻求它的起源。例如,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和可持续发展使我们不得不采用系统的或有机的方法,而无法恪守方法论个人主义;知识经济的核心问题是资源创造,而不是新古典主流的资源配置;新奇的不断突现要求我们更注重定性的研究并与数量分析相结合,而不是脱离现实的数学形式主义;持续的经济转变需要我们把“生生不已”作为“看问题的出发点”,而不是硬把它塞入到均衡分析的框架中;“北京共识”的精髓是多样性和创新,而非“华盛顿共识”的最优和机械思维。在目前的经济学中,演化经济学就是前者的代表,而后者则是所谓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因此,为了迎接这种时代的挑战,21世纪的经济学正面临着一种革命性的变化,而演化经济学则是这种变化的主导力量。演化经济学就是对经济系统中新奇事物的创生、传播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经济科学新范式。经济学范式的转变将使新古典主流成为传统经济学,而不再是“现代经济学”的前沿。

经济学范式的转变实质上就是世界观的根本性变化。正如老制度学派经济学家汉密尔顿指出的,人类在某种领域中探索的进展常常与其他领域中的进展是互补的,而且,如果某种领域中的突破是划时代的,那么它就会对许多其他领域中人类的思维习惯产生深远的影响。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业已说明,新古典范式形成于边际革命时期对经典物理学的类比和模仿。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普里高津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经典科学不承认演化和自然的多样性。作为科学的一种新范式,演化和多样性的思想是在19世纪下半叶的生物学革命中诞生的。20世纪初的量子力学革命更淋漓尽致地发挥了达尔文的不确定性思想,20世纪下半叶的复杂科学本质上也与达尔文革命具有一致性。与牛顿主义的时间可逆、本质论思维和决定论世界观形成鲜明对照,达尔文主义则是以时间不可逆、个体群思维和不确定性的世界观为特征的。与目前仍被牛顿主义所支配的主流经济学相反,新的世界观则构成了演化经济学的科学基础。

回顾历史,德国演化经济学家威特曾指出,在19世纪下半叶,在两个不同的学科几乎同时发生了库恩式的“科学革命”,一个是自然科学当中著名的“达尔文革命”,而另一个则是经济学中的“边际革命”。这种巧合确实是对历史的讽刺,因为不可能再有比这两种革命

所追求的目标更对立的了，边际革命所确立的是一种倒退的、牛顿主义的和反历史的经济学主流。在过了一个多世纪之后，现在是否到了逆转这种趋势的历史时期？威特的回答是，目前的经济学确实需要达尔文式的范式革命。实际上，早在 1898 年，凡伯伦就向经济学家们提出了，“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演化科学”？马歇尔也宣称，“经济学家的麦加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非经济力学”。然而，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却历经坎坷，到了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它已被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所遗忘。只是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演化经济学才开始被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所注意。因此，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八木纪一郎认为，如果以演化思想为基础的经济学重建算是科学革命的话，那么，这种科学革命就是被推迟了一个多世纪之后才又重新开始的。

但是，这种重新开始的“科学革命”仍面临着许多严峻的挑战。首先，由于新古典主流锁定了美国一些“顶级”大学的经济学院，这将导致演化经济学在美国的发展非常迟缓。目前的主流仍满足于对新古典研究纲领进行修修补补，教条主义盛行，哈佛大学经济学学生请愿活动的失败就说明了这种情况的严重性，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似乎无法触动美国经济学的教育体制。然而，如果不冲破旧思想的藩篱，新思想就很难扎根。其次，演化经济学作为一种统一的研究纲领仍未完成。1996 年，萨维奥蒂写道，现代演化经济学完全是生物学思想加上非平衡热力学和系统理论、企业与组织理论，以及信息处理和有限理性理论的一个综合体。虽然萨维奥蒂的概括并不全面，而且现在也有了许多的进展，但演化经济学不发达的状况仍未改观却是不争的事实。面对这种“令人沮丧”的局面，许多人肯定会说，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只是纠集了一群乌合之众，演化经济学虽然新颖，但前途未卜，最好别追随这种所谓的新范式。假如绝大多数人都这样认为，那么，我敢说，我们就有可能错过中国经济学后来居上的一个重要机会。

经济思想史的观察告诉我，一种新型经济学的萌芽可以在主流经济学锁定非常严重的国度被发现，但它的成长和壮大很可能就要转移到其他国家，特别是如果某个国家的经济将来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学也会成为大家竞相模仿的对象。最近几年，我一直存在着一种直觉上的判断，这就是演化经济学将有可能在中国获得更快的发展，并有可能在 21 世纪下半叶领导经济学的国际潮流。我的这种判断主要来自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与林毅夫

和汪丁丁两位先生的观察相同,但观点不同。林毅夫认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家大多先后产生于当时的世界经济的中心,而中国的经济规模在 21 世纪 30 年代很有可能超过美国,特别是中国快速和剧烈的制度变迁为中国经济学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机会,这就决定了研究中国问题很有可能产生一批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汪丁丁则把中国经济学家的问题意识归结为“大范围制度变迁”,认为这是西方经济学家所不具备的。我赞同他们的这些观察和看法,但我不同意他们对新古典主流的绥靖态度,因为如果要处理“大范围制度变迁”,我们不仅必须打破新古典假定不变的所有前提条件,而且也需要一种更新颖的方法,而这正是演化经济学一直在尝试的工作。总而言之,追随西方主流在中国不可能产生世界级的经济学家;在演化经济学基础之上,如果没有重大的理论创造,中国的经济学将来也不可能成为人们竞相模仿的对象。

我的第二个理由是基于生物学中的“异地物种形成”原理。进化生物学认为,同一物种之间的竞争有利于渐进的“有效率”突变的实现和选择,但这种竞争禁止了需要一套互补性(超静态)突变的新物种的形成。换言之,当自然选择的压力有利于现有的每一物种对环境的适应并与其他物种共演时,它禁止新物种的形成,自然选择的压力甚至导致了演化过程的停滞。这种停滞的“间断”往往发生在相对被保护的边缘地区,这也就是说,新物种的形成和演化要远离原物种数量巨大、竞争激烈的地区,这就是异地物种形成的条件。这不仅解释了历史学派不可能在古典经济学家群星灿烂的英国繁荣起来,也解释了新古典主流不可能产生于历史学派曾占统治地位的德国,更说明了演化经济学的大发展不可能在美国发生。因此,中国在新古典主流经济学这种旧范式的发展上落后于美国,这不是灾难,而是机遇。如果只从边际革命算起,新古典经济学已有 130 多年的历史,而演化经济学如从 20 世纪 80 年代算起,才只有 20 多年的历史,并且其发展受到了主流经济学思维很大的影响。因此,演化经济学不仅非常弱小,而且也有着较大的缺陷。但这正是中国经济学家的机会。我们不仅要敢于接过这种异端的工作,而且还要勇于批评它。中国经济学家不能妄自菲薄,因为中国经济学的草创需要血气方刚之气概与独立自主之精神。否则,领导未来的经济学新潮流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发展目前需要做好以

下几项工作。首先,编写一本相对成熟的基础原理教科书。经济学本科教育是经济学发展的基础,西方演化经济学之所以发展缓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演化经济学没有进入本科课程,而且缺乏一套能被人们系统学习的知识体系。其次,展示解决中国问题的独特魅力。例如,如何理解“北京共识”的演化经济学基础,如何系统地总结我国 20 多年的改革经验,如何回答 21 世纪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这是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发展目前所面临的首要挑战。第三,稳步拓展新范式,在经济学各分支学科引入演化经济学的新思维。例如,目前国内外产业经济学教科书讲授的前沿是新制度学派,而演化经济学在这个领域的大量成果几乎完全没有反映。因此,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将导致经济学的许多分支学科发生重大变化。第四,探索相对完善的研究纲领。研究纲领的核心是世界观,但要对实际的经济研究产生重大影响,就必须把世界观转变成能引导理论体系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正面启示法。而要做到这一点,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创造者不仅需要强烈的问题意识,而且也要在科学哲学上有所创造。无疑,这是演化经济学的一项长期和艰苦的工作。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是通过对演化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而实现的。笔者曾提出,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演化经济学的各种研究传统已有了很大的发展,系统地整理演化经济学已有成果的时机已经成熟,如果能在新的框架下相互杂交,这将有可能在理论上产生重大的创新。正如 19 世纪下半叶新古典经济学创建者的工作经由马歇尔之手加以整理、精练和综合,使其以较完备的形态而出现一样,这项工作对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然而,目前的演化经济学视野仍是有较大局限性的,例如,它虽然正确地强调了新奇惊异对研究纲领的重大意义,但对人文关怀则重视不足。因此,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发展需要在西方演化经济学的基础之上进行创新。其中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以新奇惊异和人文关怀为纲领,对更广泛的异端传统进行较全面的综合。笔者认为,自古典经济学解体后,经济学研究就分裂成了两大传统:一种是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上升为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另一种则是反对新古典的异端经济学各流派,这些流派大都采用的是历史的和演化的方法。因此,对西方异端经济学各种传统给予更多的关注将是中国演化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基于以上考虑,我们组织翻译了这套演化经济学译丛。自 2000

年以来,笔者就希望把演化经济学的著作翻译介绍到国内,曾多次联系出版社,但直到现在,承蒙高等教育出版社也有志于为中国经济学时代的到来做知识准备,这个夙愿才得以实现。这个译丛所收录的著作主要是西方演化经济学含义上的。但是,为了使读者对演化经济学的兴起更广泛的智力背景有所了解,我们在本译丛中还选录了有关经济学危机和新方向的两种著作。而且,创新经济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最成熟的领域,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在科学技术和知识经济的研究上较充分体现了演化经济学的魅力所在,因此,本译丛收录了这方面的最新著作。此外,在著作的选择上,考虑到我国后发优势理论研究的需要,本译丛还特别注意到了演化经济学对发展中经济的研究。所有的著作都是笔者从2001年以来新出版的著作中精选出来的,以期较全面地反映西方演化经济学及其相关方面的最新发展。

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将贯穿整个21世纪。当我们在世纪之初瞻望演化经济学的未来之时,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文化是科学的母体,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原创性发展将是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及其新创造的产物。经济学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吾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经济学家应该认识到他们所肩负的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是为序。

贾根良

2004年9月20日晨于南开

中译本前言

本书实际上是《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现代文选：关键性概念》的中文版，原英文版由霍奇逊先生从欧洲演化政治经济学协会自1991年以来出版的论文集中选编出的论文所构成。我们知道，本书主编霍奇逊先生的许多重要理论著作需要翻译，但为了反映欧洲演化政治经济学协会作为一支重要的学术力量对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并考虑到该书具有理论观点多样化以及更直接地与现实问题相联系的特点，限于翻译力量的严重不足，笔者只能对他的专著忍痛割爱了，首先选择了由他所主编的这本著作。

然而，笔者考虑到，该书英文版在反映欧洲演化经济学制度主义一翼的成果上还是略显单薄了，而且虽然第九章和第十章在该书的体系中具有自身的特点，但对于我国读者来说，其材料由于事过境迁而有些陈旧了。因此，为了给我国读者提供更新的和信息容量更大的读本，笔者征得原书英文版出版社和霍奇逊先生的同意，由笔者选编一些论文并经霍奇逊先生认可，收录到本书中文版中出版，并替换掉第九章和第十章的内容。但在中文版的目录中，我们仍保留了这两章的题目，而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则是新增内容。

中文版原来拟增加的论文初选了七篇，但由于该书已向原英文版出版社支付了版权费用，而拟增加的其中三篇论文由于杂志社对版权费要求过高，我们只好放弃了。这样，本书没有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欧洲制度主义演化经济学的概貌。所幸的是，目前收录的三篇论文是在欧洲演化政治经济学协会出版物之外选编出来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不足。而且，这三篇论文也得到了作者和杂志社免费使用的许可，笔者在此对他们的无私帮助致以衷心的感谢。

作为本书的中译本前言,笔者认为有必要首先对欧洲演化政治经济学协会做一简单介绍,其材料就来自该协会的网站:<http://ea-epe.org>。然后,笔者要对“演化经济学”、“制度与演化经济学”以及政治经济学这些术语之间的关系做一简单说明。

欧洲演化政治经济学协会是1988年在伦敦附近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酝酿成立的。该协会的主要目的是在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中,推动演化的、动态的和实在论的方法得到发展,并反对过度形式化和空洞无物的正统经济学的理论化。在“演化政治经济学协会”这个名称中,“演化”的含义是指其理论方法集中在变化和转变而不是静态或均衡上,“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是在对社会经济体制中人类经济行为进行跨学科分析的意义上使用的,并试图按照它最初在18世纪和19世纪被使用的方式使其得到丰富和发展。欧洲演化政治经济学协会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提出了如下替代性的理论观点:

第一,对实际经济体制中的相关趋势和联系进行渐次的和批判性的抽象分析,而不是采用把虚构看作是正当方法论的做法,这种方法回避了对真实世界现象进行分析的困难。

第二,分析是开放性的和跨学科的,除了经济学,它还要利用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和历史学中的相关材料,而不是采用一种僵化的方法对经济学进行定义,这种僵化的方法不分青红皂白地被应用到了对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分析上。

第三,它把经济看作是一种在历史时间中得到发展的累积和演化的过程,面对未来,行为者面临着严重的信息问题和不确定性,因此,它没有把理论焦点唯一地集中在均衡上。

第四,它所关注的焦点是交互作用的社会过程和推动技术转变的力量。通过交互作用的社会过程,偏好得以形成并发生改变。它还关注这些要素在一个整体的经济系统中的交互作用,而不是把个人和他们的偏好看作是既定的、把技术看作是外生的、把生产和交换看作是分离的。

第五,它把市场本身就看作是一种社会制度。欧洲演化政治经济学协会认为,市场必然是由其他社会制度网络如国家等所支持的,市场并不是没有限制的,也不是机械地优先于其他制度。它反对把市场看作是一种理想的或自然的秩序,反对把市场只看作是个人的加总。

第六,它认识到了,社会经济系统依赖于通常是脆弱的自然环境

和复杂的生态系统,并嵌入于其中,因此在理论发展和政策建议上,它反对忽视生态和环境问题的流行趋势。

第七,研究是价值驱动的和政策导向的。它认识到了民主参与过程在识别和评价真实需要中的核心地位,而不是把手段与目的、事实与价值分裂开来的效用(主义)观点,这种观点忽视了行为者之间的社会关系、矛盾和不平等。

第八,演化政治经济学协会从以下大量的著名作家那里获取灵感:约翰·康芒斯、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尼古拉斯·卡尔多、迈克尔·卡莱茨基、维廉姆·凯普、梅纳德·凯恩斯、马歇尔、卡尔·马克思、缪尔达尔、佩鲁、卡尔·波拉尼、琼·罗宾逊、约瑟夫·熊彼特、乔治·沙克尔、亚当·斯密、索尔斯坦·凡勃仑、马克斯·韦伯,灵感也同样来自于制度主义和演化的思想。

欧洲演化政治经济学协会是一个非营利性的经济学研究与教育机构,其目的是按照该协会上述理论观点,在欧洲以及世界的其他地方,致力于推动和发展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的演化和制度方法。其主要功能是通过召开会议、建立信息网络、成立研究团队和出版研究成果等,把追求这种理论研究和政策发展目标的欧洲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们组织起来。协会并不墨守任何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非常欢迎认同其研究思路或愿意与之进行公开争论的学者参与其活动,其目的是为经济学各流派之间的讨论提供一个多元主义的论坛。

目前,该协会是欧洲异端经济学家最重要的联合会,也是欧洲经济学家第二大联合会。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演化经济学家尼尔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后凯恩斯经济学家帕西内蒂以及奥地利经济学家罗思柴尔德曾担任过该协会的名誉主席。该协会每年颁发凯普奖(奖金2 000欧元)、缪尔达尔奖(奖金2 000欧元)、赫伯特·西蒙青年学者奖(奖给35岁以下的学者,奖金1 000欧元)。目前,该协会已出版15种以上的论文集和专著,并将于2005年6月开始出版由霍奇逊主编的《制度经济学杂志》。

正如许多其他西方异端经济学组织一样,欧洲演化政治经济学协会的成立也是为了扭转因为主流经济学的日益狭隘和数学形式化所导致的经济科学日益衰微的趋势。霍奇逊认为,为了逆转这种趋势,经济学专业有必要为这个学科重新命名,就像19世纪末以“经济学”替代“政治经济学”那样。笔者认为,马歇尔在当时之所以赞成这

种做法,其本意是要扩大经济科学的范围。但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的经济学主流却摒弃制度、技术、政治、人类心理、生态环境和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致力于发展一种不受这些因素影响的和给定资源条件下的最优配置的经济学,其最终结果是导致了经济科学范围的日益狭窄。

自 19 世纪末以来,在新古典经济学以及目前的主流经济学中,似乎存在着一种心照不宣的看法:“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中的“政治”所代表的因素无法反映“经济学”这种“客观科学”或“实证科学”的性质,这是导致“经济学”替代“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动机。但是,正如彼得·索多鲍姆在《诺贝尔经济学奖:新思想的绊脚石》一文中指出的,新古典范式在美国许多大学经济学系的统治地位本身就说明了,发展一种“纯粹的”经济学这种计划已经失败,这将使这个学科自然地重新起用“政治经济学”这个 19 世纪所使用的学科名称。实际上,许多异端经济学家们从没有放弃过同时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个学科名称。例如,在 1999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百科全书》中,所谓古典经济学解体后的政治经济学就包括了异端经济学各流派,但没有包括作为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

事实上,本书的主题和内容本身就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2004 年下半年,在南开大学经济学系的比较经济学研究生课程上,本书的翻译草稿曾作为主要的阅读文献被同学们所使用,大家对此也深有同感。但为什么霍奇逊却使用了制度与演化经济学这个名称呢?从目前情况来看,西方经济学界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对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恢复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科学代名词的可能性已经基本上不复存在了,而霍奇逊所倡导的这种经济学也只是部分地与狭义政治经济学相重叠。因此,制度与演化经济学除了在其学科范围内可以纳入除“政治”之外更广泛的因素外,它还可以突出制度与演化这种新颖的范式和方法。更重要的是,这个名称可以更好地体现一种新经济学的学术使命。

然而,在老制度主义经济学家们的眼中,虽然“演化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是等价的,但在美国和英国,老制度主义学者们在这两个术语的使用上却有不同的偏好。1965 年,美国老制度学派把他们所建立的组织命名为“演化经济学协会”,据说这是因为当时深有影响的艾尔斯认为制度是被动的以及他不喜欢制度主义这个术语的缘故。霍奇逊先生更喜欢“制度经济学”这个术语,而很少直接使用“演

化经济学”这个学科名称。例如，他所成立的研究中心就是以“制度经济学”命名的，或者在“演化经济学”之前非要加上“制度”这个定语不可。笔者推测，霍奇逊之所以这么做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对他们来说，制度是他们最重要的研究主题，二是霍奇逊可能想通过“制度”这个定语排除掉数学化的复杂系统理论和演化博弈论等。但实际上，新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包含了许多制度以外的研究内容，更适合的名称还应该是演化经济学，这个名称在中国还具有与新制度经济学相区别的特殊含义。

读者在阅读本书后就会发现，这个文选的论文主要是来自于西方异端经济学的四个流派：老制度主义、奥地利学派、马克思主义风格的调节学派以及“新熊彼特”学派，而没有包括后凯恩斯经济学和女性主义经济学等其他的异端经济学流派。因此，这个论文选也符合笔者在2002年对演化经济学所包括的经济学流派所划定的范围。但是，为了适应解决我国实际经济问题的需要并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的定义和范围需要进一步扩大，这就是我之所以提出新的演化经济学要对西方几乎所有的异端经济学流派进行综合的原因。这种综合需要秉承一种继承、批判和创新的科学态度。部分地就是因为这个原因，2003年在劳森的《重新定向经济学》刚一出版，笔者就决定翻译这本著作。但是，劳森的这本著作有三章的版权属于杂志社，到目前为止，这一问题仍未解决。笔者在此对该书翻译出版的延误向读者致歉。如果这本著作仍能出版，笔者将再进一步讨论演化经济学的新综合问题。

本书的翻译分工如下：贾根良（中文版前言、导论、第4章和第11章）；徐尚（第2、5、6、13章）；王晓蓉（第12、14章）；马国旺（第1、3、7、8章）；徐尚同学译制了本书的人名和主题索引英汉对照表（只限于原英文版，不包括新增的论文）；刘洪海同学承担了与新增论文作者进行联系的部分工作；全书由贾根良校订并修改定稿。2004年12月，本书的翻译曾作为中期成果之一申报了200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目前该项目已被批准（05BJL044），此外，本译丛的翻译得到了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的资助，笔者特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贾根良
2005年4月